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二辑）

Le Programme Cooperatiste

合作原理比较研究

[法] 查理·季特 (Charles Gide) 著 彭师勤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編 李天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經濟學(第二輯)

Le Programme Cooperatiste

合作原理比較研究

〔法〕查理·李特 (Charles Gide) 著 彭師勤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作原理比较研究/(法)季特著;彭师勤译. —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68-5

I. ①合… II. ①季…②彭… III. ①合作主义(经济学)—研
究 IV. ①F091.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649号

合作原理比较研究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68-5/F.359

定价: 84.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1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棒，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法〕查理・季特（Charles Gide）著 彭師勤 譯

合作原理比較研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出版

中譯本著者新序

經濟的綱領也和政治的綱領一樣多，新中華民國對於凡以「採用我的綱領罷，這是最好的了」的話來包圍她的人，勢必至有無所適從之苦。

承彭君不棄，將本書譯爲中文，使我在這裏也有機會向新中華民國提出一個綱領來。假如這綱領只是著者個人的理想，那我倒不敢將牠舉薦——但是這個綱領確是八十年間由五十國所得到的實際經驗。就是和中國接壤的大國——俄羅斯，其私人商業也爲合作所淘汰。再沒有別的社會制度能够有這樣足以自豪的成就。

然而我並不想使人們就以爲本書所陳述的意見，已由五千萬消費合作社的社員所贊同。實際上本也不是如此，因爲社員中的大部份，絕無所謂綱領，他們之所以進合作社，只是爲得一方節省本人的耗費，一方按年獲得多少贏餘。惟是不知不覺地贊助了一種偉大的運動，那就是擬以新的合作組織去替代商業中現有組織的運動。這新的合作組織，是不再如今日一樣，由賣者——商人所統轄，而是由消費者所主持，將要把一切牟利的企圖破壞以盡。在本書中我曾試把這新經濟學的大綱加以發揮，同時又將牠和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各種爲人所唱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相異之點指示出來。

我對於中華民族的習俗和歷史，所知甚淺，但是據我看來，她似乎較其他各國更容易瞭解并容易實現合作的經濟。結社在中國的各種企業中早已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中國國民生活的基礎，是立在家族之上的，消費合作會社正是家族生活——家常經濟的擴充。牠把贏利的追求消滅了，而以服務的互助去代替。

假如能因這本書使那幅員遼廣的中國懂得合作，我真引為無上的榮幸。光明原屬來自東方，然而也有好的東西發軔西陲，中國人會有一天脫合作就是這麼一種的好東西。

查理·季特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日序於巴黎

（同年八月五日譯者譯於史特拉斯堡）

PREFACE POUR L'ÉDITION CHINOISE DU "PROGRAMME COOPERATISTE"

Les programmes économiques sont aussi nombreux que ceux politiques et la jeune République de Chine va être harcelée par tous ceux qui lui diront, "prenez le mien, c'est le meilleur!"

Et voici que je lui en présente un aussi, grâce à l'aimable traduction de M. PENG. Si ce programme n'était qu'une œuvre personnelle de l'auteur, je n'oserais le recommander, mais il a pour lui 80 ans d'expérimentation pratique dans cinquante pays. Et dans le grand pays limitrophe de la Chine, en Russie la coopération a déjà presque éliminé le commerce privé. Il n'y a aucun autre système social qui puisse se flatter d'un tel succès.

Je ne voudrais point cependant faire croire que les idées exposées dans ce livre sont toutes partagées par les 50 millions d'hommes qui sont membres de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de consommation. Non, car le plupart n'ont point de programme du tout et ne sont entrés dans les coopératives que pour toucher annuellement quelques bonis. Mais, sans le savoir, ils collaborent à un mouvement colossal qui tend à remplacer l'organisation actuelle du commerce par une organisation

nouvelle qui sera gouvernée non plus par le vendeur, par le marchand, comme l'est celle d'aujourd'hui, mais par le consommateur et dans laquelle toute préoccupation du profit sera éliminée. J'ai essayé de dessiner dans ce livre les grandes lignes de cette Economie nouvelle et de montrer en quoi elle diffère soit du régime capitaliste actuel soit des divers systèmes socialistes qui ont été proposés.

D'après le peu que je sais de l'histoire et de mœurs de la nation chinoise, il me semble qu'elle est faite, mieux que tout autre, pour comprendre et pour réaliser l'économie coopérative. Déjà l'association tient une grande place dans toutes les entreprises chinoises. C'est la famille qui a été le fondement de la vie nationale de la Chine, or la société coopérative de consommation n'est qu'un agrandissement de la vie de famille de l'économie domestique. Elle élimine la concurrence pour le profit et la remplace par la mutualité des services.

Je serais très heureux si ce livre pouvait servir à faire connaître la coopération dans cet immense pays. C'est de l'Orient que vient la lumière; mais il y a aussi de bonnes choses qui viennent de l'Occident et vous le direz un jour de la Coopération.

Paris, le 3 Août 1930

CHARLES GIDE.

再版著者引言

本書乃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度在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講授之紀錄稿本。第一版原分數小冊印行。

再版本對於原文稍有增損。「合作與政府之關係」在講授時無暇論及，今亦於再版本中增一短章。這個合作主義原理之概括的敘述，後來曾於庇墨學派一書中重行提到，惟範圍比較狹小而已。

查理·季特

合作原理比較研究目錄

中譯本著者新序(附原文)

再版著者引言

第一編 合作主義綱領

第二編 經濟學家

第一章 自由經濟學派綱領

第二章 經濟學家眼光中的合作主義綱領

第三章 合作主義者眼光中的自由經濟學

第四章 兩學派間的差別

第一節 自然律

第二節 平價

第三節 消費者的教育

第四節 利潤合法與否問題

一
一二
一二
二四
二九
三二
三四
三六
三八
四〇

第三編	社會主義者	四四
第一章	前馬克思社會主義	四四
第二章	前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合作主義的共同性	五五
第三章	合作主義和前馬克思社會主義不同之點	五七
第四章	馬克思社會主義	五九
第五章	馬克思學說與合作主義學說之異同	七〇
第六章	合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歷史上的關係	七三
第七章	社會主義者的合作社	八一
第八章	羅時達派與莫斯科派間的對立	八五
第四編	同業組合主義者	九一
第一章	同業組合主義者綱領的演進	九一
第二章	合作主義與組合主義的衝突	一〇〇
第三章	兩租運動間的瞭解方式	一〇五
第四章	無政府主義	一一〇